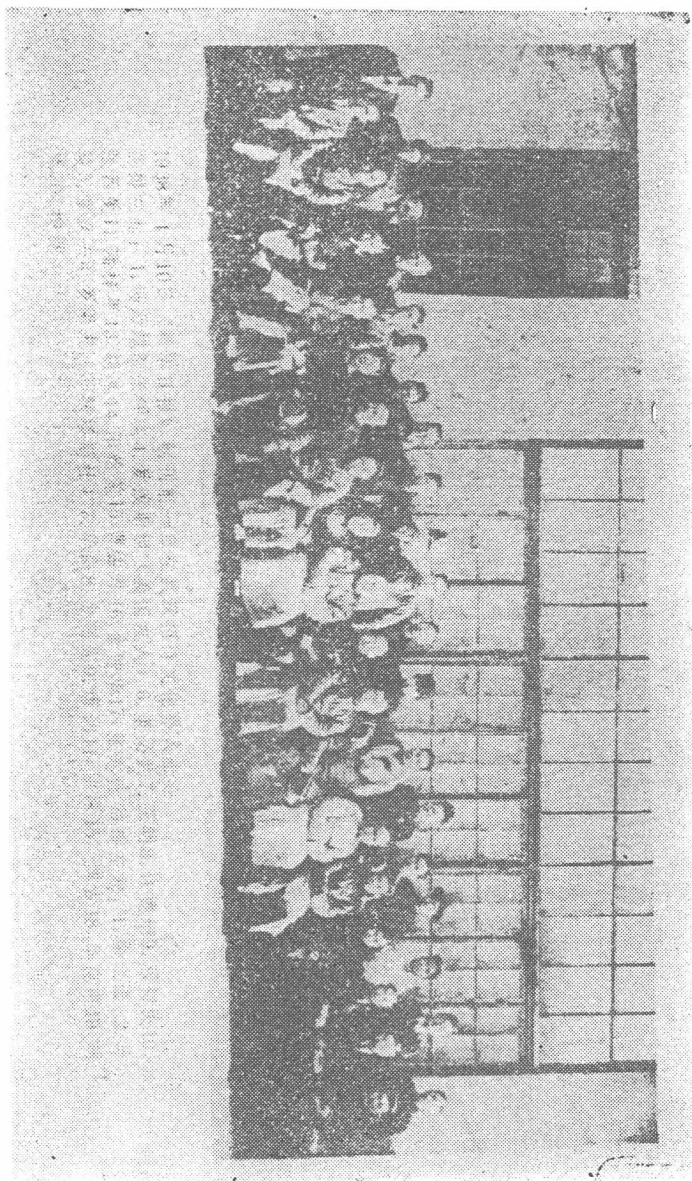


党的喉舌 抗日号角

——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武汉分会 编著
华中师范大学编写组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党的喉舌 抗日号角

——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武汉分会
华中师范大学编写组 编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封面题字：张友渔

责任编辑：禾 木

堅持長期抗戰
爭取最後勝利
新華日報出版
周西來
廿七·九

序 言

章 开 沅

当前正处于走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时代，但这不等于可以忘记过去，特别是不能忘记过去那些艰苦奋斗、英勇抗争的岁月。我赞成着力批判传统文化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消极心态与保守观念，因为这是当前妨碍开放与改革的极大惰力。但是，我不赞成用粗暴的、简单的办法来笼统否定一切传统，甚至践踏一切传统，因为传统中本有精华与糟粕的区分。明明是自己不争气，却把过错统统推到前人与老祖宗的身上，这样的民族决不是有出息的民族。

因此，我对《党的喉舌，抗日号角——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一书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新华日报》从创办到迁移，在武汉九个月的时间里，高举团结救国、持久抗战的旗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及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也就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新华日报》以大量的篇幅，向国内外读者介绍了陕甘宁边区与晋察冀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展示了抗战建国的光明前景，并且忠实地报道了抗日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新华日报》以自己的宣传与鼓动工作，组织与推动后方的亿万群众投入抗战洪流，同时也为广大民众争取抗日民主权利及改善社会生活状况而奋斗呼号。正因为如此，《新华

党的喉舌 抗日号角

——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武汉分会
华中师范大学编写组 编写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科经销
华中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75 字数211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7-5622-0289-3/K·21

印数：1—1500 定价3.15元

日报》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与欢迎，成为伟大民族战争中催人奋进的号角，照明前进道路的灯塔，同时也为新闻舆论战线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宝贵经验。

《新华日报》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成果。抗日战争以前，共产党的报刊没有可能在全国公开发行。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蒋介石及国民党代表，经过多次谈判，争得了在国民党统辖区出版发行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的合法权利。在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艰难创业，于1938年11月在武汉创刊，成为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公开发行的第一张报纸。因此，《新华日报》可以看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与历史记录，她所提供的历史经验至今仍可作为正在酝酿中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借鉴。

华中师大的广大师生对《新华日报》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因为她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工作人员，曾经担任我校各级领导工作，许多干部与教师早年也是由于《新华日报》的指引而走上革命道路，潘梓年、王自申的名字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由我校教师编写的《党的喉舌，抗日号角——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一书，不仅总结了《新华日报》在武汉时期的历史经验，填补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同时也是对于革命前辈的诚挚纪念。本书的出版，将帮助读者学习、继承党报忠于事实、忠于人民、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精神与优良传统，踏着先驱者开拓进取的足迹，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四化”大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1988年于桂子山，时为《新华日报》创刊五十周年。

目 录

引 言

- 一、《新华日报》的诞生……………(1)
 - (一) 争取出版合法权利……………(1)
 - (二) 南京筹备……………(5)
 - (三) 武汉筹创……………(9)
 - (四) 创刊号面世……………(17)
- 二、动员一切力量坚持长期抗战……………(24)
 - (一) 宣传团结抗战、持久抗战……………(24)
 - (二) 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32)
 - (三) 真诚合作的抗日园地……………(36)
 - (四) 促进国际统一战线的发展……………(46)
- 三、忠实报道与记载抗日斗争……………(58)
 - (一) 揭露敌寇侵华阴谋……………(58)
 - (二) 清除抗日障碍的一个有力工具……………(66)
 - (三) 战绩报道……………(81)
 - (四) 鸟瞰：敌后抗日根据地……………(94)
- 四、联系群众的纽带……………(104)
 - (一) 救亡运动的支持者和组织者……………(104)
 - (二) 批评、监督和读者会……………(112)
 - (三) 爱国者的学校……………(117)
- 五、反破坏、反封锁、反查禁……………(135)

(一) “一·一七”事件和第一次天窗·····	(135)
(二) 抵制对报道与出版的检查和限制·····	(138)
(三) 扩大新闻来源与打破封锁·····	(145)
(四) 维护报纸声誉·····	(152)
(五) 反查禁抗日书刊的斗争·····	(154)
六、编辑与发行·····	(165)
(一) 特殊环境下的编辑与改版·····	(165)
(二) “读者信箱”的特殊使命·····	(170)
(三) 冲破阻力、广泛发行·····	(179)
七、战斗的“新华军”·····	(191)
(一) 教育与关怀·····	(191)
(二) 抵制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7)
(三) 充满革命情谊的战斗集体·····	(200)
(四) 战地采访·····	(207)
(五) 团结新闻界共同抗日·····	(211)
(六) 抗日爱国运动的楷模·····	(215)
(七) 信任和重托·····	(218)
八、为战备迁移而奋斗·····	(225)
(一) 切合时宜的决策·····	(225)
(二) 舆论准备·····	(227)
(三) 周密部署·····	(230)
(四) 艰苦的路程·····	(231)
结束语·····	(255)
附：武汉时期《新华日报》大事记·····	(258)

引 言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它于1937年10月，筹备于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后临时政治军事中心——武汉。同年10月25日，迁到号称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出版发行，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政府非法封闭，报馆人员光荣撤往延安为止，前后历时9年零49天。它在9年多的战斗中，经历了幼年、成长、成熟和发展的阶段。短短的9个多月的武汉时期，是它的幼年阶段。

《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地带创刊发行，对指导我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都具有极其伟大的战略意义。运用报刊宣传革命思想、指导工作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光荣传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开始发动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就把创办报刊宣传革命思想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基本任务。恩格斯指出：在每一个政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报纸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推进革命运动，独立创办了《新莱茵报》。《新莱茵报》的创刊发行，对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在德国和欧洲革命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00年12月，列宁为了发动俄国人民进行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国外同普列汉诺夫等

商定创办了《火星报》。《火星报》成为思想上、策略上统一党的认识的重要阵地，克服了思想上分离、组织上涣散、政治上动摇等倾向，凝聚了革命政党的核心力量，终于使“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火焰，把沙皇帝制和资产阶级政权烧成灰烬。1912年4月，斯大林、阿尔敏斯基遵照列宁的指示，在国内出版了《真理报》。这个报纸代表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拥护和支持，尽管反动统治者对它采取了取缔、罚款、没收的高压政策，终于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下，影响越来越大，随着它成长起一整代革命的无产阶级队伍，成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仍然紧紧抓住报纸指导党和苏维埃的斗争。

我国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运用报刊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唤起民众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巨大作用。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都宣传了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介绍并歌颂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先进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对唤起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都起了重要作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分别创办的《新社会》、《湘江评论》、《觉悟》、《互助》等期刊，也都宣传了革命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进一步唤起了民众的觉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创立后，1922年至1927年间，先后创办的《共产党》、《向导》、《前锋》、《中国工人》等刊物和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对加强党的建设和动员群众参加工农革命运动以及北伐战争都作出了贡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和《斗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办的《无产青年》，苏区中共中央出版的《战斗报》等等，都对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新军阀的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人，为了使党有自己的报刊指导革命工作，他们都为《新华日报》在武汉的创刊发行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从而使该报在抗战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在武汉坚持出版287期。5月2日曾休刊一天。报馆的馆址开始在汉口府西一路（今民意一路大陆里口）149号，后来因报纸营业扩大，于8月1日迁至府东五路150号，在武汉沦陷前，于10月21日迁至五族街54号，编辑部设在与五族街交叉相邻的界限路44号。报馆为了扩大发行宣传工作，除在武汉设立总馆外，还在晋、陕、川、粤、豫、鄂、湘、赣、黔等省的一些城市先后建立了分馆和代销处。

该报在武汉期间，由于技术设备简陋，图书资料匮乏，工作人员鲜少，共产党员不多，担任这一神圣工作的几位主要领导和编辑，对新闻出版事业又没有经验；同时，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报纸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说，该报在武汉时期在业务上和政治上尚处于幼年阶段。

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尽管处在幼年阶段，但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指引，有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直接领导，报馆负责同志领导全馆人员，一方面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进行了适当的抵制；另一方面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这一切使报纸从创刊时起，得以顽强地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地带，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从事政治、思想、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斗争，开展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展爱国民主运动，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战事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等方面的有力舆论武器。这表明：它不仅与国民党的报纸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与非官方的其它资产阶级报纸相比，在政治上也表现出它是一张旗帜鲜明的、具有无产阶级党性特色的党报。由于它是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鼻子尖下出版发行的，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所创办的报纸又有所不同。这种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促使它学会了把党的公开斗争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经受了各种困难环境和复杂局面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使它在共产党创办的报纸中别具一格。

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所发挥的这些历史作用，在我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就世界新闻史来说，也是一部稀有的遗产。因此，研究《新华日报》的历史，总结《新华日报》的历史经验，不仅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华日报》的诞生

《新华日报》是在武汉创刊的，创刊前的筹备工作是从南京开始的。由于京沪战局紧张和国民党内少数顽固分子制造种种障碍，报纸原拟在南京出版的计划未能实现。报馆筹备处迁汉后，再经过与国民党政府新闻出版的当局，反复的交涉和艰苦的筹办，终于使《新华日报》在1938年1月11日于武汉面世。从此，在新闻战线上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插上了一面红旗，成为了党的喉舌和动员全国人民抗战的号角。

（一）争得出版合法权利

在国统区创办党报的决策 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由内战过渡到抗日战争时期所决定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促进国共两党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抗战，需要在国统区创办报刊。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军民义愤填膺，奋起抗战，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转变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了发动全国各族人民参加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正式向全党提出要在全国内抓两件事：一是办学校，培养干部；二是办报纸，宣传党的抗日主张^①。

^①熊复：《关于新华日报的历史地位及其特点》，《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这是两件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英明决策。

蒋介石的承诺 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创办《新华日报》出版的合法权利，首先必须争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参加抗战，并迫使其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合法地位，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争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在国统区创办共产党的报刊，七七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此前后，中共中央还多次要求国民党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取消《新闻检查条例》，即1934年8月，国民党政府为压制人民言论而制定的《检查新闻法大纲》^①。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起草并为这次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重申了上述要求，《纲领》指出：“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②这些要求都是直接针对国民党当局多年来所实行的统治舆论、垄断舆论的政策，争取我党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出版发行报刊而进行的舆论斗争。其中关于释放政治犯这一条要求经过谈判已部分实现，就为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报刊获得了大量的干部来源。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派出了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组成的代表团，到南京、庐山、奉化等地同国民党代

表团张冲、邵力子直到蒋介石本人，举行两党合作抗战会谈。7月17日，国共两党代表团在庐山举行正式会谈，中共代表团根据党中央的战略远见和决策，在会议中力争获得在南京创办党的报刊的合法权利，除提出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及各抗日党派平等地位等问题外，还正式提出在南京创办发行党报党刊的问题。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从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建立封建法西斯王朝以来，除了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外，还在全国其他地区发动了文化“围剿”，在他们的统治区一点民主自由的影子也没有，更谈不上有言论、出版和新闻的自由，任何一种稍带进步的书报、期刊都不允许发行。因此，在会谈开始时，蒋介石就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他的统治区域内出版发行报刊。

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抗日报刊，动员人民抗日，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周恩来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在天津主编过《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和《觉悟》杂志。他深知革命报刊对动员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具有重大作用。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出版报刊的决策，在会谈中据理同国民党代表团反复力争会后还亲自找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单独面谈。邵力子为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当面表示说：“可以嘛！可以考虑。”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当时对此事也很热心。他说：“这样可以沟通国共两党关系。”^①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也在口头上表示同意共产党在其统治区出版发行报刊，但这时蒋介石对抗战仍没有下定决心。他的态度“只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03页。

^① 邵黎黎：《邵力子与新华日报》，《团结报》，1988年5月7日。

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因而一再乞求和平，对中国共产党7月15日交给他并要求其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采取拖延观望的态度，搁置起来。因此，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和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发行报刊的问题，尚未得到最后解决。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上海军民奋起抗战，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怒潮。此时，蒋介石感到如果继续压抑人民的强烈抗日要求，自己的统治地位就有垮台的危险。同时，日寇猖狂进攻上海，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于是蒋介石才被迫于8月22日，下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按战斗秩序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司令。这一切为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发行报刊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22日，蒋介石在战局继续恶化，在中共代表团多次催促和强烈要求下，才命令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被延搁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他说：“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①《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8月25日，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3万余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司令，

^① 《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分批渡过黄河，开赴山西前线抗战。至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国统区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就为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发行报刊取得了合法的权利。不久，邵力子签署了文件，正式批准《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发行。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取得出版发行报刊合法权利的过程表明：这是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的严重危机而举国一致要求团结抗战的结果；是共产党代表团同国民党代表团经过8个多月曲折、复杂、激烈谈判的结果；是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开赴前线抗战的结果；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

（二）南京筹备

潘梓年等受命筹备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1937年8月25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由秦邦宪任书记，委员有董必武、叶剑英。他们都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同时，在南京傅厚岗66号（今南京梅园新村）建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京办事处。10月，《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就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正式开始了。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释放政治犯的协议，1937年10月初，刚刚走出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国民党监狱的潘梓年、章汉夫、钱之光、吴敏（杨放之）徐迈进、袁冰、何云等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聚集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奉命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领导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由潘梓年、章汉夫等负责^①。潘

^① 夏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12月17日。

梓年负全面责任，章汉夫负责编编，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

筹办人员受命以后，即奔走于南京街头，找房子搞设备，办理出版发行手续。由于蒋介石答应《新华日报》在他的统治区出版发行是完全出于被迫的，因此，从《新华日报》筹办伊始，蒋介石就采取了两面三刀的态度；一面在口头上继续允许它在南京筹创发行；一面却暗中阻挠。当时，南京处于国民党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人们不敢把房子卖给共产党，加之京沪战局紧张，筹办工作困难重重。由于共产党的团结抗战政策深得民心，艰难筹办中的报馆，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首先，袁冰和章汉夫在新街口租了一间房子，接着又在附近租了房子。因陋就简，前者准备作营业部，后者作了编编部。不久，印刷机及厂房问题，通过地下党员沙文威（史永）的同学张尔华的帮助，也得到了解决。张尔华在南京《朝报》工作，他是潘梓年在上海艺术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与潘关系密切，又与南京印刷界有联系。他对《新华日报》的筹办很热情，通过他的帮助，报馆找了一家印刷厂。同时，又筹集了一笔经费，除去房租费外，由钱之光派赖祖烈到上海买了几百令纸和一些器材。经过筹办人员艰苦努力，就将印报机较快地安装了电源及其他设备。筹备工作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解决，一切准备就绪，只欠办理出版登记手续了。

筹备处迁汉 报管在申请办理出版登记手续的关键问题上，遇到了重大的阻力，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报刊，不能单凭国民党某些领导人的口头承诺，还必须到国民党政府新闻出版部门办理出版登记手续，取得正式的出版发行证。蒋介石这时虽不敢公开阻挠《新华日报》筹办工作，但为了堵塞共产党人在他的统治区传播革命真理，却指示他的爪牙令

南京市政府中管理新闻出版的有关单位，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出版登记手续上，借故刁难，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出版登记，发给出版登记证，使《新华日报》不能创刊。

当时，在南京领有出版登记证的报刊，说起来有几十家，实际上每天出版的只有十几家。他们中有的打着办报的幌子，招摇撞骗，街上从未看见他们的报纸出售。在旧社会办报的登记证是可以买卖的。国民党南京市政府既然不发给出版登记证，于是筹备处就花钱买了一个，取得了出版的“合法”地位。周恩来介绍钱之光请于右任题写了报头。于右任擅长于书法，《新华日报》四个大字，写得苍劲有力；同时他既是国民党元老，又是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请他写报头，有利于加强国共两党合作气氛。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周恩来在指导《新华日报》的筹办中，就巧妙地考虑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办，一切筹备就绪，南京《新华日报》进入了试版的阶段。

由于人民处于无权的时代，这时报纸的出版发行，仍然遇到蒋介石及少数顽固分子的横蛮阻拦。蒋介石原来估计共产党在经济上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没有具备应有的办报的物质条件；在政治上，一切又在他的严格控制下，要在南京出版一种大型的日报是不可能的。当他看到送审试版时，却大吃一惊，十分反悔，借口首都报纸太多，战局紧张，横蛮地食言不准出版，使报纸在南京出版的计划一时无法实现^①。

11月11日，日寇占领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接着自沪杭和苏北分兵包抄南京。11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表迁

^①潘梓年：《〈新华日报〉的回忆片断》，《新华日报的回忆》第5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渝宣言后，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及行政、监察、立法、司法、考试五院相继迁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央党部，南京政府的外交、财政、内政等重要部门，以及蒋介石等主要军政人都员先后集中到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为国统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上海沦陷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刘晓等人。电报指出：上海失陷以后，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将转移至武汉，党与非党的干部，一部分应去武汉，一部分应去战区。叶剑英等在南京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到南京朝夕难保，根据党中央致潘汉年等的电报精神，决定报馆迁到武汉。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也打电话给潘梓年，要《新华日报》迁到武汉创办。叶剑英、李克农等考虑到国民党内的一些顽固分子，必将在武汉继续阻挠《新华日报》的创办，要迁汉的报馆筹备同志，作好成功与受挫的两手准备。同时他们还于11月20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说：“《新华日报》在京已无可能开办。报馆人员均先赴武汉，汉夫先走，梓年随后亦到，到武汉后，即继续办理合法手续。但估计他们势必采取拖延态度。故梓年、汉夫可先去武汉，从事文化活 动。关于文化运动当前方针均与梓年、汉夫谈及，他们都同意的。报馆尚余5000余元，……800多令纸张，准备运陕，唯因风雨关系，堆置码头风吹雨打，诚恐会成霉烂。”^① 筹办人员根据这一电报精神，章汉夫等一部分人员首批赴汉，11月下旬，其他人员亦相继撤汉^②。钱之光派赖祖烈把所有纸张

① 1937年11月20日李克农、叶剑英电洛甫、毛泽东，引自《新华日报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② 潘梓年：《新华日报的回忆片断》，《新华日报的回忆》，第53页。

运往西安。

（三）武汉筹创

建立筹备处 由于馆址的迁移，报馆在南京筹办过的许多事情，如馆址、设备安装以及申请办理出版登记等一系列的工作都需要重新开始。

报馆在武汉的筹办，最初是在董必武的亲切关怀下，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和中共湖北省委的支持下进行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由长江局直接领导。

1937年9月，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从延安来到武汉，领导开展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一带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建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等。同年10月中、下旬，董必武直接领导建立了中共湖北省委，在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一号（现民意一路安仁里一号）建立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2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人员抵汉后，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合并，迁到汉口旧日租界一二八街89号（现长春街75号）。中央湖北省委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建立，为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建立和《新华日报》在武汉的筹办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1月23日，潘梓年等在南京筹办党报的几位负责人都已抵汉，董必武指示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为他们在汉口成忠街53号安置了住所，并领导他们在这里立即开展了筹办工作。这时，许涤新、华西园（华岗）、蔡馥生、石西民、高松涛、何云、楼适夷、戈宝权、张尔华、杨慧琳、沃静霞、谢佩玲等也陆续来汉，立即投入了筹创《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战斗。

建立组织机构制定章程 1937年12月9—14日，中共

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秦邦宪、项英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以指导中共在长江流域各省和南方各省的工作，并代表共产党向国民党及其它民主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秦邦宪、陈绍禹等抵汉。同月23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内设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由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何凯丰、林伯渠、项英等组成。陈绍禹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兼统战和军事部长。

中共中央长江局为了加强对《新华日报》的领导，在党内专门设立了党报委员会，由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伟、潘梓年组成。陈绍禹任主席。另外，在报馆方面设立了董事会，受长江局领导。董事会由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等组成。陈绍禹任董事长。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处于严密的保密阶段，为了工作方便起见，党报委员会对外也称为《新华日报》董事会，这两个领导机构的设立，对报馆的筹办和发行工作起了直接的积极的领导作用。

在党报委员会和董事会的领导下，《新华日报馆章程》很快制定出来。

《章程》规定：董事会是报馆的最高权力机关，下设一室三部，即经理室、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在室部以下分别设立编辑、采访、校对、发行、广告、排字、材料、印刷等课（科）。在发行课下设日报股、周刊股、丛书股等等。另外，还设立了一个救亡室和一个相当于不管部性质的特种委员会。

《章程》中对办报的宗旨规定十分明确：“本报以报道新闻、发扬文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对人事

任免和奖惩办法，各部门的职责以及会议制度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此外，还规定在发行1000份以上的地区设立分馆，在销售10份以上的社会团体、机关、学校设立分销处。

《章程》为了应付国民党政府注册报纸和报馆对外业务上交往的需要，作了策略性的应变措词。它写道：“本报系独资经营，资本暂定为10万元”。这种说明是要使外界感到《新华日报》的经营规模不仅与它的政治地位相称，而且不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和《扫荡报》之下。当时，这几家报馆都设在武汉，是发行全国的三大报纸。

《新华日报馆章程》的制定，使筹办人员进一步明确了办报的方向，加快了筹办进程。

在组织机构的建立方面，按照《章程》的规定，参考苏联报馆的建制经验，逐步建立。最早建立的是由潘梓年、华岗、章汉夫、杨放之、楼适夷、陆诒等组成的编委会。接着，对各部的人事作了具体安排。总经理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由潘梓年担任，1938年5月，熊瑾玎来报馆工作，潘梓年改任社长，由熊瑾玎担任总经理。华岗任总编辑，章汉夫任编辑部主任。对编辑部各单位人员也作了安排，杨放之负责撰写评论主管专栏文章，石西民负责国内新闻，何云负责国际新闻，楼适夷负责《团结》副刊。《群众》周刊属报馆编辑部领导，由许涤新负责编辑。关于日报经济问题的编辑工作由许涤新兼任；采访课除由陆诒担任主任外，还有杨慧琳、张企程。由于张企程还要挤出一半时间帮助楼适夷搞副刊。因此，时人流说《新华日报》只有两个半记者。

此外，对报馆其它各部门的人员也作了安排。印刷部和营业部主任分别由袁冰和易吉光担任。由于共产党的组织当时需要严格保密，报馆在筹办阶段未公开建立党的组织。

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华军” 在报馆各级组织机构建立之后，中共中央长江局从四面八方调来了一批职工队伍，最初约有30余人，创刊后增加到60余人，组成了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华军”，对报纸的筹办进行了艰苦的奋斗。他们中既有来自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革命家。如潘梓年、华岗、章汉夫、钱之光等人。他们都经受过严酷的革命斗争考验，政治上成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素养较高，才思敏捷，善于写作。又有来自“九·一八”以来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爱国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中的共产党员骨干，以及受过共产党教育和影响的抗日积极分子，他们革命热情高，不怕艰苦，有一定的对敌斗争的经验；还有一批从事多年印刷工作的工人，如汤宝桐等人，他们多是南京《朝报》随厂迁来或招聘而来的，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印刷工作经验。此外，通过湖北武汉中共地下党组织，调来了易吉光、周何亮等人。他们熟悉湖北和武汉的情况，为报纸的创刊发行作了很大贡献。另外，经过各种社会关系吸收了一些来自社会低层的其他工人和爱国青年。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组成的“新华军”，虽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但党外群众较多，多数为身强力壮的男同志，也有女战士。周恩来、董必武等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和亲切的关怀。总经理潘梓年、总编辑华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和革命工人，同他们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共产党员都能起带头模范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这样，使全体筹办人员作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因此，筹办人员虽少，生活又极其艰苦，但大家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筹办处很快凝成了一个团

结一致、纪律严明的战斗堡垒。

冲破控制 要创办报刊，首先要解决馆址、厂房、机器、纸张等设备和物资。这些工作是由徐迈进负责办理的。

当时武汉已有20多家日报、晚刊，多得数不胜数的三日刊、五日刊、周刊、月刊，其中多数是受国民党控制的。蒋介石虽口头允许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报刊，实则不愿意；他又控制了武汉大批机关住房和物资，继续刁难共产党在汉筹办《新华日报》。而《新华日报》和在南京筹办一样，依然从零开始，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在多难兴邦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武汉各界人士抗战热情很高，共产党的团结抗战政策又深得民心。许多爱国人士对处于困境筹备中的报馆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徐怨宇的帮助下，徐迈进、张尔华在国民党武汉市政府斜对面的大陆里，租到了两栋楼房。一栋作编辑部办公室；另一栋在大陆里左手临府西一路149号，这里原是天津《益世报》的一个驻汉特派记者私人所创办的《壮报》地址，有一架四开平板印刷机。这个记者因战事严重、经济困难，准备停刊前往重庆，决定将全部房屋、设备转让。范长江、张尔华从徐怨宇处得知这一消息后，协助徐迈进等用2000元将这栋房子及室内机器设备全部买下，做了营业部、印刷厂、会计室和传达室。

与此同时，徐迈进为采购纸张、油墨等物资奔走于街头巷尾时，发现武汉各界人士普遍具有不同程度的爱国思想，都愿对抗日救国做点贡献。他便把筹办工作与抗日宣传结合起来，当他向一家旧家俱店租凭家俱时，向这家商店老板，宣传了创办《新华日报》的宗旨和意义，感动了对方，破格地以较低的租金，将一批桌、椅、床等家俱，租赁给了报

馆。

此外，报馆在南京迁汉前夕，曾通过在南京《朝报》担任编辑的共产党员何云，把业已停刊的《朝报》印刷厂全套设备买过来。这套设备在一些友好人士的支持下，克服了运输工作中的重大困难，安全地运到了武汉。该印刷厂的大部分工人也相继来汉，参加了报馆的筹办工作。由于袁冰曾在上海读书出版社工作，对印刷和发行工作很内行。在他和徐迈进等共同组织下，筹办人员很快将排字房、机印房的设备安装好了。设备技术虽然十分简陋和低劣，不能与当时当地任何报社相比，但毕竟可以出版日报了。

11月底，筹备处的人员持邵力子在南京签发的文件，到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申请办理出版登记手续时，不出叶剑英等所料，和在南京申请办理注册一样，遇到了麻烦。蒋介石令其亲信陈立夫、张道藩授意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指使有关管理新闻出版的当局，在报馆申请注册时，重演了国民党南京市政府借故拖延阻拦的故伎。

筹办注册手续虽然受挫，但经办人员没有灰心。他们一面继续同国民党有关当局据理交涉；一面电请中共中央出面再找国民党上层交涉，解决出版问题。同月底，潘梓年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对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新闻出版单位，无理阻挠《新华日报》的创刊提出了批评，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报刊的严正要求。

《群众》周刊鸣锣开道 报纸注册受阻时，报馆了解到国民党政府对刊物出版控制较松，同时还可以直接向国民党武汉市政府申请办理出版注册手续。武汉市市长吴国桢赞同国共合作抗日，国民党内的一些顽固分子，这时只注意到共产党要出版日报，未曾料到还要出版杂志。于是潘梓年决

定试探一下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提议：如果暂时不能解决《新华日报》的出版问题，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发行《群众》周刊，邵力子表示同意。

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徐迈进立即持邵力子签署的同意《群众》周刊出版的文件，向国民党武汉市政府申请为其办理出版注册手续。国民党武汉市政府中的少数顽固分子，唯蒋介石之命是从，和南京那些阻碍《新华日报》出版的反动官员如出一辙。他们根据国民党政府的出版法，规定一个刊物的出版，必须交基金保证费600元。徐迈进当时口袋里只有6块钱，他知道报馆也无这笔巨款。中共中央长江局党报委员会核定报馆的开办经费总共只有3000元，买《壮报》印刷厂和其它设备已开支2000多元，所剩无几。他只好回报馆找潘梓年等商议，问能否设法筹措这笔钱。得到的回答是：别说600块，连60块现在也拿不出来。徐迈进只好再到武汉市政府，做经办注册人员的工作，希望能通融一下。经反复交涉，终于办理了《群众》周刊注册出版手续。从此，筹办《新华日报》的人员，在日报没有获准创刊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创办《群众》周刊。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于1937年12月11日，正式与读者见面了。《群众》周刊着重刊载工、农、青、妇等方面的理论以及全国各地抗日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由于它从编辑、出版直到发行，都是由筹办中的《新华日报》办理，所以实际上是《新华日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胜利创刊发行，为《新华日报》的出版，打开了缺口，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群众》周刊创刊后的第7天，周恩来到武汉，他立即找邵力子询问《新华日报》注册受阻的情况。邵力子要中共

中央出面找武汉市市长吴国桢交涉，因为自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迁到武汉后，武汉市就不属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管辖，而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特别市，吴国桢可以不听命于何成浚。邵力子还亲自为《新华日报》的注册问题找了吴国桢，设法防止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从中作梗^①。

同月20—21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等，同国民党代表团蒋介石、陈立夫等继续举行两党合作抗战会谈。会谈中，周恩来除了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协助政府改组和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说明外，还就《新华日报》的出版问题，再次向国民党代表团提出了要求，并作了详细的说明。蒋介石对中共方面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表示：“所谈甚好……完全同意”^②。

周恩来等说服了吴国桢、邵力子直到蒋介石之后，《新华日报》在武汉的创刊便排除了障碍。报馆便立即派员直接找吴国桢交涉。吴国桢看到邵力子签署的同意《新华日报》创刊的批件后，当即批准为《新华日报》办理注册出版手续。至此，报纸出报权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解决。

试版成功 报馆编辑中，多数缺乏编辑经验，但大家十分努力，曾分别在上海《立报》和南京《朝报》担任过编辑的徐迈进和何云，首先设计一张查阅报纸标题字型所占行数的统计表。接着，全体编委经过多次讨论对比，最后确定了如下的版面形式：第一版社论、广告；第二版国内主要新闻；第三版国际重要新闻；第四版副刊，取名团结和读者信

^① 邵黎黎：《邵力子与新华日报》，《团结报》1988年5月7日。

^② 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61页。

箱等。报头仍采用于右任在南京的题字。另外，还决定从创刊号起，在报眼处根据每天社论精神，刊登形象生动的为社会各界所喜闻乐见的漫画，以增添社论的战斗精神。这样的版面设计形式，新颖活泼，内容丰富多采，不但与国民党的报纸完全不同，而且与非官方的报纸相比也表现明显的特色。所以报纸创刊后，就有人指出：《新华日报》无论就形式或内容来说，都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流的。

为了搞好试版工作，周恩来向潘梓年、章汉夫指出：应依靠群众办报，应拿着报纸到朋友中征询意见，约写文章。筹办人员遵照指示，将试版广泛地征求了各界人士的意见，反复地改进编辑、排印等方面的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进行了多次成功的试版。至此，《新华日报》在武汉的筹办工作一切就绪。

（四）创刊号面世

招待会和“新华军”大会 1938年1月9日，总经理潘梓年在报纸试版成功的情况下，在汉口普海春餐馆举行招待会，设宴招待中外各界人士，以报告办报宗旨。出席招待会的有50余人，其中有武汉市市长吴国桢，文化界知名人士沈钧儒、张西曼、张志址、邓初民、洪深、张申府、刘清扬、胡秋原，以及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苏联塔斯社记者罗果夫等。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也出席了招待会。

会上，潘梓年介绍了报纸等筹备经过，略谓：本报3个月前就已经开始筹备，原计划在南京出版，一切机器用具都已布置就绪，可是由于战争扩大，敌军深入，只好迁到武